

# 鼓浪屿研究

第五辑

Journal Of Gulangyu Studies

主 编 周 旻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 鼓浪屿研究

第五辑

---

Journal Of Gulangyu Studies

主 编 周 旻

厦门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  
厦门市社会科学院  
合 编

鼓浪屿国际研究中心  
主 办



厦门大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鼓浪屿研究. 第五辑 / 厦门市社科联编. — 厦门 :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6.12  
ISBN 978-7-5615-6376-2

I. ①鼓… II. ①厦…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311181 号

---

出 版 人 蒋东明

责任编辑 许红兵

特约编辑 刘 璐

封面设计 李嘉彬

责任印制 朱 楷

---

出版发行 厦门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39 号

邮政编码 361008

总 编 办 0592-2182177 0592-2181406(传真)

营销中心 0592-2184458 0592-2181365

网 址 <http://www.xmupress.com>

邮 箱 [xmupress@126.com](mailto:xmupress@126.com)

印 刷 厦门市万美兴印刷设计有限公司

---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9

插页 2

字数 220 千字

印数 1~1 000 册

版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5.00 元

---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



厦门大学出版社  
微信二维码



厦门大学出版社  
微博二维码

# 目 录

|     |                    |                                   |
|-----|--------------------|-----------------------------------|
| 1   | 周 旻                | 《鼓浪屿历史名人画传》导言                     |
| 34  | 洪峻峰                | 丛刻新编有古芬<br>——“同文书库·厦门文献系列”第一辑前言二篇 |
| 45  | 洪思明<br>(Sebastian) | 鼓浪屿天主教史初探                         |
| 50  | 陈娟英<br>陈宝属         | 文物是鼓浪屿历史演进的直观见证                   |
| 76  | 何书彬                | 一个小岛的金融版图                         |
| 83  | 龚 洁                | 鼓浪屿林氏府与福州三坊七巷<br>——简述台湾林本源家族的婚姻关系 |
| 87  | 彭一万                | 日本“智能犯强盗”后藤新平与厦门                  |
| 98  | 黄绍坚                | 仁力西：一位苏格兰姑娘在厦门的传奇人生               |
| 112 | 吴永奇                | 厦门抗日秘密战线奇才陈镜辉                     |
| 131 | 方碧勇                | 桃李满天下的教育世家<br>——周寿恺家族故事           |
| 135 | 王日根                | 故人往事中的历史浮现<br>——《鼓浪屿故人与往事》读后      |
| 附 录 |                    |                                   |
| 141 | 黄晓波                | 鼓浪屿历史吸引外国学者                       |

# 《鼓浪屿历史名人画传》导言

周旻\*

鼓浪屿注定要有许多故事,而这些故事所处的地理空间、历史遭遇、政治生态、文化构成、艺术性格等诸多要素,综合诠释着这个小岛的种种命运。故事的主角就是鼓浪屿历史名人。本人选择鼓浪屿从古到今 240 多位历史人物,以学术研究和艺术方式兼容的创意,力图完成一部鼓浪屿历史名人的人物志长卷。将碎片化的个案研究与观察,纳入相对系统的学术梳理,获取文献与学术价值;同时,数百幅中国人物画传的艺术形式,书画诗文印一体,状其鲜活。

## 一、英雄注目日光岩下这片海域

明隆庆元年(1567),丁一中始任泉州府(海防)同知,他是当时闽地著名儒士。曾遍游闽南名山古寺,留下不少石刻笔迹。1573 年,丁一中来到嘉禾屿(今厦门),游鼓浪屿,登临日光岩,浩浩天风,阵阵涛声,激发出丁同知的一段豪情。于是他在岩壁勒下“鼓浪洞天”四个大字,由此成为鼓浪屿的正式命名。

登高必赋,乃一种文化传统,古往今来,官员或文人写文章说话,远不如在最高处的显眼位置刻上几个大字更具影响力。“鼓浪洞天”的左侧“鹭江第一”四字是清道光进士林鍼所写,“鹭江第一”上方的“天风海涛”四字是民国四年(1915)许世英(晚清遗臣福建巡按使)所写。三幅石刻形成一道亮丽的风景,气势非凡。

丁一中的题刻更多赞叹鼓浪屿的天生丽质,而面临战事的明人陈士京登陆鼓浪屿,则绝不是为其美景而来。

1648 年,陈士京航海来到鼓浪屿,辅佐郑成功,筑鹿石山房以居,与徐孚远等创立“海外几社”。陈士京是最早参加郑成功军队的人士之一,也是郑成功军中的重要人物。1646 年 12 月,郑成功在烈屿(小金门)会文武大臣,定盟复明,次年移舟广东南澳招兵,陈士京就在那里参军。从 1648 年起,他定居鼓浪屿,并参与策划军国大事,有些重要事情,郑成功还请他出马主持,郑成功甚至让儿子郑经拜陈士京为师。

1647 年 5 月,郑成功移兵鼓浪屿,仍奉故主隆武年号。在国姓爷的认可下,陈士京往来唐鲁两阵营,居中调停。1648 年年底,在陈士京的建议下,郑成功决定归附永历皇帝,一番筹备之后,陈士京奉郑成功之命往广东肇庆朝见永历皇帝,从闽南往肇庆,一路迂回,路上盘缠用尽。书生身无长技,只能为人占卜算卦谋生前行。

到了永历朝中,陈士京三次上疏陈述军事,力主打通闽粤之路,以扩充南明政权实力。

\* 周旻:厦门市社会科学联合会 福建 厦门 361000

但此时,永历朝中党同伐异,陈士京慨然上疏,痛陈其弊。朝廷欲加封陈士京左都御史官衔,陈坚辞不受。第二年,他回到厦门,宣读诏书,封郑成功为延平郡公,这就是郑成功“延平王”爵号的由来。郑成功由此高举政治上的旗帜,号召海内外抗清力量,进而跨越海峡,击败荷兰舰队,收复台湾。

高人总是有智慧的。顺治十六年(1659),郑成功北伐,委托陈士京参与岛上留守事务。是年陈病卒,年六十五。“茫茫鼓浪屿,以息逋臣翅”(《四明谈助》陈光禄营圻),继14年的岛居生活之后,陈士京又长眠于孤岛鼓浪屿。陈士京墓原在鼓浪屿之笔架山,民国初年迁葬鸡山北麓。

由台湾海峡延伸至日光岩水操台下的这片海域,历来就是兵家夺岛的战场。

1682年,康熙帝排除朝中反对意见,决定攻台,命福建总督姚启圣统辖福建全省兵马,同提督施琅,进取澎湖、台湾。厦金海域与明郑军鏖战几个来回,战舰齐聚,风帆正举。1683年6月,施琅指挥清军水师先行在澎湖与郑克塽水师展开海战,清军获得大胜。后郑克塽率臣民降清。

乾隆五十九年(1794),同安人蔡牵下海为盗寇,船帮驰骋于闽、浙、粤海面,劫船越货,封锁航道,颁发令旗通行证,收“出洋税”。嘉庆七年(1802),他率船队攻厦金的大担、二担山,500余众登岸,夺炮13门。

嘉庆十三年(1808),蔡牵举起反清复明的旗号,率领船只攻打台湾,占据沪尾(今台北县淡水镇),奉明正朔,建元“光明”,祭告天地,散札设官,自称“镇海威武王”,威胁到艋舺(今台北龙山区)、府城(今台南市)一带,全台为之震动。清朝政府见形势严峻,命令闽浙水师提督王得禄、浙江提督邱良功,集两省兵舰,入台征剿,合兵围攻。海盗军长期作战,伤亡甚重,内部分裂。蔡牵战败退走,王得禄督师穷追不舍。

日光岩下这片海域,是蔡牵十分熟悉的战场。他经常把劫来的宝藏藏在鼓浪屿。

消灭蔡牵的清代福建水师提督王得禄,不忘在鼓浪屿勒石记功。撰文于嘉庆十八年(1813)的石刻,记载了王得禄在鼓浪屿三和宫前整修战船、募款兴修三和宫并率师进剿蔡牵武装力量之事。该石刻保存完好,虽宫庙不存,但所保留的石刻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是目前厦门面积最大的一处摩崖石刻。

道光二十年(1840),祁寓藻奉旨和刑部侍郎黄爵滋赴福建视察海防建设及禁烟事宜。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他上疏道光帝的建议都极有针对性且富有远见。

1. 建议闽浙总督宜驻泉州督办防务,因为英国的武装船只大多停泊在漳州和泉州海域,泉州为扼要之区,所以总督每岁暂住泉州,督办防务,非常必要。

2. 建议将福建沿海的炮台改为炮墩。祁寓藻等到达福建后,看到福建沿海不同于广东沿海,海岸线比较平直,没有内港可守,炮台必须建于海边。由于海边沙滩的质地比较疏松,所以炮台根基不牢固。受这一条件的限制,福建沿海炮台小,炮位少,再加上大炮不能灵活转动,所以不仅不足以控制海面,而且极易受到攻击。因此,祁寓藻与闽浙总督邓廷桢等上折建议改炮台为炮墩。所谓炮墩,就是一种用麻袋装上沙子,层层堆积,再用废旧小渔船的船舱向内竖立捆绑在沙袋上而形成的变相炮台。它有这样几个优点:(1)节省人力物力,制作速度极快;(2)具有较强的防御能力,敌人的炮弹不易穿过沙袋而伤及守军。炮墩的出现,填补了这些地区的防御空白,并弥补了清军大炮落后造成的重大缺陷。道光二十年(1840)七月,厦门之战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

3. 建议朝廷应重视海战,制造可与英军抗衡的大船、大炮。祁寯藻看到英国军舰不仅坚固,而且舰身大,每舰载炮多达数十门。而中国水师战船却小而简陋,无法出海作战。因此,祁寯藻奏请在广东、福建、浙江三省迅速添造可载大小炮位三四十门的大船 60 只,闽、浙并铸四千斤至八千斤的大炮 200 门,添设于沿海各口。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有远见的建议。林则徐、魏源等人也曾要求制造大船大炮,认为海上作战,“船炮水军万不可少”。令人遗憾的是,这一极有价值的建议却被道光帝轻易地否定了。祁寯藻这种建造大船大炮、重视海战的思想,已经具有近代海防的朦胧意识。

4. 呼吁朝廷重视水师人才的培养,破格举荐人才。

5. 查禁烟贩,惩治汉奸。

6. 禁止漳州、泉州两府行使夷钱,凡有夹带或私铸者均要治罪。

这些建议切中时弊,大部分得到道光帝认同,并颁旨施行。7 月,英军进犯厦门,被闽浙总督邓廷桢击退,邓廷桢上折报告战况并保奏立功将士,但朝中的妥协派却诬蔑他是虚报战况,欺瞒邀功。道光帝又命祁寯藻核查厦门战况,通过认真调查,祁寯藻用确凿的证据证明邓廷桢所奏属实,从而揭露了妥协派的诬蔑,保护了抵抗派将领。

厦门战役可谓惨败。因为这一回,清军是有足够准备的。1841 年 2 月 17 日,颜伯焄来到福州任所,即全力以赴地投入战备。3 月 2 日,颜伯焄抵达厦门,便立即着手改造防务。到 8 月下旬开战之前,历时 5 个月,耗银 150 万两,他终于将厦门建成大清帝国疆域内最强大的海防要塞之一。

然而这个最强大的海防要塞却不堪一击。

战争是在 8 月 26 日打响的。下午 1 时 45 分,港内风起浪涌,璞鼎查指挥英舰纷纷起锚进攻。颜伯焄则坐镇城中,亲自指挥厦门岛南岸、鼓浪屿、屿仔尾守军“三面兜击”来犯之敌。经 1 小时 20 分钟炮战,鼓浪屿三座清军炮台被敌打哑。英军最后从鼓浪屿突破,下午 3 时 45 分,即开战两个小时后,英军在厦门本岛登陆。15 分钟后,石壁阵地陷落。在长列炮台死守的金门总兵江继芸孤军激战后多处负伤,蹈海牺牲。不久,全岛各阵地均告失守,厦门被占领。

《南京条约》签订,厦门被辟为通商口岸。厦门开埠之后,英、美、西、法、德、日、荷等国陆续在鼓浪屿设立领事馆,日本挟甲午战后的狂傲之势,对清政府提出了推广日本在华专管租界的要求,厦门的鼓浪屿也在其中。日本借口东本愿寺失火之事,调兵进占鼓浪屿。日本企图独占鼓浪屿的野心,不仅遭到地方官绅的抵制,而且引起了其他列强的注意。

面对此种局面,美国领事巴詹声向许应骙提议,将鼓浪屿划作公共租界,既可杜绝日本独占的野心,又可兼护厦门,一举两得。许应骙虽也认为这是抵制日本强占厦门鼓浪屿的良策,但毕竟涉及国家主权,他颇为踌躇,专门致电与他共同筹划“东南互保”的刘坤一、张之洞、盛宣怀。刘坤一对于许应骙的想法甚为认可。后在李鸿章的赞同下,许应骙在福州分别与美、英两国领事会商相关章程。

在鼓浪屿公共租界章程草约签订的过程中,许应骙希望鼓浪屿公共租界“兼护厦门”,并将此列为第十五款。有论者认为,鼓浪屿公共租界设立在甲午战争之后,是清政府主动开辟的第一块租界,是晚清福建对外开放之举,且体现了清政府官员“被动之中力求主动”的发展观。

## 二、基督教高效率向东方传播的解读

唐太宗贞观九年(635),基督教开始传入中国,但当时传入中国的是当年一度被认为是异端的聂斯托利派(中国称景教,现称“东方亚述教会”),后来在唐朝会昌五年(845)被禁止传播。元朝时基督教(景教和罗马公教)再次传入中国,称为“也利可温”(蒙古语“有福缘的人”),元朝灭亡后又中断了。明朝万历十年(1582),天主教耶稣会派来利玛窦,他被允许在广东肇庆定居并传教,曾一度成功地使天主教在中国得以立足。

清朝雍正五年(1727),东正教开始在中国传播。1807年,新教派遣马礼逊来华传教,新教也开始在中国传播。鸦片战争以后,基督教以沿海通商口岸为基地迅速发展。

为什么偏偏是基督教新教为主的教会文化得以先期进入传播最靠前面的序列?因为中国近代化的起始环节离不开这个媒介的作用。考察近代历史可知,由英国起源的所谓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生产方式,滋生了以自由主义为主要特征的资本主义精神,加快了近代化的进程。

近代化的终极目的在于比较完整地抛弃封建性,实现理想的现代性。一百多年来中西学术界关注的实质问题是现代性问题。基本达成的共识是,现代性作为价值观念的整体,涉及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科技理性和多元文化等诸多方面。其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核心点是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市场经济制度得以运转的轴心是资本及资本的人格化代表,即资本阶层。因此,如何评价资本阶层的道德作用,就成了思想理论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话题。

在当代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资本及其资本阶层或称资本主义对道德的否定作用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贪婪性,二是奢侈性,三是世俗性。不过,贪婪性、奢侈性和世俗性只是反映了资本及其资本层本性的一个方面,如果仅仅止于此,那些热闹血腥的繁荣,很快就会终止。值得重视的是,某种道德重建功能,使得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不会崩盘,而且会继续发展。其表现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对主体自由与创新的不懈追求。人们通常把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当作近代资本阶层主体自由话语的始作俑者,康德的“哥白尼革命”则发展出主体自由话语的典型形态,黑格尔把主体与绝对精神结合起来,使主体自由发展至登峰造极的程度。主体自由主要通过资本阶层在市场经济中的创新行动体现出来。就资本阶层的企业经营而言,包括创造新产品、采用新工艺、开辟新市场、寻求新的供货来源、创建新的组织制度等。

二是对社会平等与公正的永恒向往。市场经济要求内部成员在交易过程中平等待人,才能避免像封建领主那样通过战争强取豪夺。另外,他们深知社会混乱失序和外部侵扰对本阶层的资本经营会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为此,他们创制出政党制度、权力制衡制度、宪政制度等多种多样的制度形式来保障社会公正得以实现。

三是对宗教自律与博爱的道德担当。为了防止资本贪婪性、奢侈性和世俗性这样的劣质性对传统道德文化产生巨大的消解作用,西方社会宗教,特别是基督教,确立了各种道德规范。丹尼尔·贝尔认为,西方社会宗教发挥着两种功能:第一,它提供了现在与过去的连续性;第二,它一直把守着邪恶的大门。西方基督教是在经历了深刻的蜕变之后,才逐步在近现代社会发挥出强大的道德约束力的。因为在中世纪晚期,天主教会内部同样变得腐败奢靡,在基督新教的强烈冲击下,它经过痛苦的革新才逐步再次走到世人道德生活的前台。

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对之进行了深入精细的解说与论证,他

分析了新教对财富、时间和职业活动的态度。他认为正是基督教所倡导的经济理性主义,不认为财富有善恶之分,财富其实能够荣耀上帝,并作为灵魂获救的象征,促使信徒现身于经济活动、拼命工作、聚敛财富、节制享受、不断扩大投资,用财富衡量人的能力和道德,从而有了资本主义精神。

神圣天职观和新型的禁欲观认为,只要以正当手段获得并理性约束本能、节制消费,做“理性的禁欲主义者”,就会自我道德纯净。新教伦理认为,职业活动不仅是有效的禁欲手段,同时也是上帝规定的生活目的。“不劳动者不食”这一宗教箴言无条件地适用于每一个人,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都必须完成上帝授予的“天职”。这使得新教信徒能够尽职勤奋、埋头于工作,从而形成资本主义精神。

这让人想起唐代高僧百丈怀海的名言:“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它强调僧侣也要自食其力。这应该是宗教适应社会发展的生存理念之一。

要有紧迫的时间感,基督新教认为时间是无价之宝,损失时间就是损失为上帝增光的机会,浪费时间在原则上是最大的罪孽。这种教义促使信徒产生出资本主义精神中注重效率的观念。

还有博爱的社会服务意识,等等,这些观念为资本主义早期的原始积累和后来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充足的精神养料。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依旧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精神支柱作用。

总之,在马克思·韦伯撰写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尽天职、蒙恩、勤奋、劳动、上进、守信、守时、克制、俭省、理性节欲”的精神都与新教的教义伦理关系密切。

从时间和空间上看,厦门鼓浪屿成为基督新教进入中国的主要起点,进而传向各地。鸦片战争之后,大量的传教士义无反顾地涌向东方。他们的动力在哪里?理解教会文化为何能如此有效率地向东方的传播,离不开上述背景。

### 三、教育创新:岛上的校长们都在想什么?

鸦片战争以后,基督教与天主教的传教士相继到鼓浪屿建立教堂传教,并在岛上设立幼儿园、小学与中学,成为新兴的外来教育模式。1898年,由英国基督教长老公会创办的怀德幼儿园(即现在的日光幼儿园),是全国最早的幼儿园。1844至1949年,英国、美国的基督教会与西班牙的天主教会以及救济会或政府分别在岛上创办过17所小学,如:福民小学(福音堂小学)、怀仁女学(闽南最早创办的女校之一)、毓德小学、英华校友小学、康泰小学等;16所中学,如:英华中学(英华书院)、怀仁女中、海滨女子师范学校、毓德女子中学、厦大校友中学等;2所中专学校:闽南职业中学、救世医院附设护士学校;3所大专院校:回澜圣道学院、救世医院附属医学专科学校、博爱医院附属医学专门学校。特别是1906年在怀仁女学基础上创办的厦门女子师范学校,培养出了林巧稚、黄萱、黄墨谷等优秀的女学者,也造就了周淑安这样杰出的音乐英才。

1950至1990年,岛上曾有4所幼儿园:怀德幼儿园(日光幼儿园)、华侨幼儿园、鹿礁幼儿园、笔山幼儿园;6所小学:厦门师范附属小学、鼓浪屿第一中心小学(人民小学)、笔山小学、康泰小学、鹿礁小学、厦门音乐学校;3所中学:厦门第二中学、鼓浪屿侨办中学、厦门英语中学;6所中专学校:厦门师范学校、鹭潮美术学校、厦门工艺美术学院(福建工艺美术学院)、厦门鼓浪屿医院卫生学校、厦门商职业学校、厦门音乐学校;2所大专院校:厦门大学新生院、厦门中医大专班。

各个时期各类学校的校长群像,最能体现学校特色与差别,以及校长个性。

厦门最早的女学,名叫“培德学堂”,是归正教会打马字牧师娘玛丽、戴维斯牧师娘埃玛和汲澧澜牧师娘汲海伦 1870 年创办的,地点就在竹树堂附近的一座房子里。开学的时候共 12 人,包括 8 名走读生和 4 名寄宿生;次年增至 23 人。学生的大部分费用,特别是膳食费由归正教会承担,学生家长承担的费用每年约 15 至 20 元。

首任培德女学校长是万多伦姑娘。由于身体原因,1876 年万多伦姑娘返回美国,打马字的二姑娘玛丽亚接替了她的位置,主理女学近 40 年。1879 年培德女学迁到鼓浪屿,称田尾女学堂;1910 年改名毓德女校;1920 年增设中学,就是著名的毓德女中。毓德女中的教育质量有口皆碑,据说每年升入大学者比例超过 30%。林语堂的妻子廖翠凤就毕业于毓德女中。

还是在竹树堂,打马字的大姑娘清洁创办了一所男童小学,后迁鼓浪屿,是养元小学的前身。林语堂从平和来到鼓浪屿,读的就是养元小学。另外,教会非常关心成年妇女的扫盲问题,牧师娘玛丽与汲海伦很早就开始在竹树堂、新街堂组织妇女学罗马白话字,她们还经常只身或结伴下乡,到内陆地区为妇女扫盲。1884 年,归正教会在鼓浪屿创办田尾妇学堂,打马字牧师娘玛丽一直担任这所学校的主理,到她 1909 年退休的时候,先后培训了 700 多名妇女。玛丽之后,打马字的大姑娘清洁接任田尾妇学堂主理。主理就是校长。

卢铸英先后担任同安启悟小学、平和小溪育英小学、鼓浪屿养元小学等学校的校长。1910 年,卢铸英开始担任寻源中学校长。他在校任职近 20 年,在他的带领下,寻源中学教学质量稳步提升,培养了包括“文学大师”林语堂、“爱国奇人”张圣才等在内的许多对社会有用的人。卢铸英也因其卓越的教学工作,受到各界赞誉,成为鼓浪屿著名的教育家之一。1929 年,年仅 50 岁的卢铸英因长年操劳而显得老态,又加之胃病复发,已很难应付学校工作。经学校董事会批准,他休养 2 年。

林安国,鼓浪屿毓德女中校长。1921 年理清莲接任主理,华人林安国任校长,即在两个师范班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为四年制中学,才称为“毓德女中”。1925 年,该校迁至鼓浪屿“东山顶”原来寻源中学的校址。1927 年起改为“三三制”的两级中学,开始使用统一教材,宗教课改为选修,学生来源数改为本地居多。当时学生已达 200 人。中外人士达成共识,学制、课程、教材统一,培养学生上规模,这都是校长林安国的贡献。

朱鸿谟于 1917 年到竹树堂创办的宗文小学担任教员,开始其长达 42 年的教学生涯。1920 年,转入毓德女中任教(1933 年代理过毓德的校长),朱鸿谟主要教授数理化、音乐等课程。他在此执教 20 多年,为学校的发展做出了贡献。1940 年年底,他得到了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嘉奖。抗战后,他到漳州龙溪中学任教 2 年,1947 年担任养元小学校长,直到 1958 年离开教学岗位。作为三一堂的建立者之一,朱鸿谟有音乐方面的天赋,是一位出色的男低音。他是三一堂圣歌团(后改歌颂团)的首倡者,圣歌团的团长。在他的带领和调教下,圣歌团始终保持组织严谨、训练有素、水平较高的特点。朱鸿谟由此打下了三一堂注重圣乐事工的传统。这是鼓浪屿高水平音乐的一部分。

1931 年,邵庆元担任厦门毓德女中华人校长。他曾担任《江声报》总编、厦门抗日后援会委员,厦门沦陷后为避日本人追杀而至新加坡。基于民族危机,邵庆元的亮点在于比较急切地明确了他的办学方向,制定了毓德女中的“教育总纲”,提出在学习书本知识之余,更重要的是要养成“人”。于是,当时毓德女中出现了许多有趣的画面:生物课上,老师带领学生

采集动植物标本；家政课上，女学生们学绣花、裁衣服、学烹饪。邵庆元认为，毓德女中的学生无论男女都可以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为了培养女生的社会实践能力，邵庆元别出心裁地仿照社会体制组织了“校市会”，把学校称为“毓德市”，里面设有各种“行政部门”。

1904年，洪显理(Henry J.P. Aderson)受英国长老派遣来到英华书院。这位在鼓浪屿以“矮子洪”著称的苏格兰人，有人说他是苏格兰贵族，在英华一干就是二十来年，是英华校史上绕不开的名字。工部局董事长兼任校长，这一格局注定提升了英华书院的地位和影响力。

1915年，洪显理接替金禧甫，任英华书院第二任主理。洪显理在英华书院的讲台上是一个英文老师，在足球场上是领队和教练。1910年，他率英华足球队赴泉州与培源书院友谊赛，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他带领的“英华足球队”远征汕头、福州等地，每每大胜而归，成为当时牛气冲天的学生足球队。1930年，英华足球队获全厦足球公开赛锦标的纪念照片，使得我们幸通过模糊的照片看一个大概，在足球队取得胜利的留影里，前排左一站着这个有个性的矮个子洪显理。

英华书院的教育质量自然是精英级别的，但金禧甫、洪显理这两位工部局董事长兼任英华书院主理时奠定的教学格局和足球传统，影响深远。

随着西方体育项目相继传入，鼓浪屿成为中国近现代体育教育的发达地区之一，体育人才辈出，享誉国际的老一辈体育教育家马约翰、原北京体育学院院长马启伟、上海体院院长陈安槐都是鼓浪屿人。

鼓浪屿人热爱体育的性情，历来得到普遍赞扬和重视。岛上民众，特别是青年学子，由早期只能围观足球场，到开始参与足球运动及其他运动，把体育运动升级为健康人生和良好素质的必修课。清华著名教练马约翰、抗日英雄飞行员陈镇和等，都是由鼓浪屿足球传统培养起来的大人物。

林文庆，民国时期厦门大学校长。他早在辛亥革命爆发前的13年即1898年，就割掉了那条象征奴性的“头粽”，还在新加坡保守的华人社会中发起了影响深远的剪辫子运动。他营救过孙中山，是早期同盟会的革命家。

他首倡厦门大学校训“止于至善”，高薪延请海内外学者汇集厦门大学，兴盛一时，期间亦发生过厦大师生出走事件。他还兼任鼓浪屿医院院长，为支持厦大，他将为人诊病所得、全年薪金以及夫人的私房钱献给厦大。1937年厦大改为“国立”，林文庆返回新加坡。

林文庆虽守旧但不保守，还曾撰文批判辜鸿铭的保守。他是新加坡有名的社会改革家，却在新马发起并领导了持续十年之久的“孔教复兴运动”。他坚持儒家，但不迷信儒家，曾劝导人们要改革、简化慎终追远的丧葬仪式。他在以儒家思想和圣人之言熏陶厦门大学莘莘学子的同时，把厦门大学建设成了知名大学。

林文庆身处地域偏僻、文化落后的厦门，自然丧失了许多与当时的文人学者频繁交往的机会。后期因厦大财务危机，林文庆不得不频频往返于厦门和南京、厦门和福州乃至厦门和南洋之间筹款，与林文庆打交道的多为政客与商人。

林文庆生前撰写的大量文章著作，不是躺在厦门大学图书馆的故纸堆里，就是被束之高阁，收藏在新加坡的图书馆中。历史碎片化淹没了他的存在感。就目前而言，国内学界中，大概只有那些研究鲁迅的学者曾听说过林文庆的名字，在鲁迅研究者的眼中，林文庆被视为一个反历史潮流的“小丑”。或许，我们倒可以认可鲁迅对林文庆“尊孔的”“孔教徒”的描述，

这反而是一种基于事实的客观说明。林文庆曾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大学校长,亲手参与创办并全程主掌私立厦门大学长达16年,不该被遗忘。

#### 四、郁约翰和岛上中医们的“救世”之道

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传教士兼医师雅裨理(David Abeel)将西医传入鼓浪屿。鼓浪屿成为近代中国最早传入西医、西药的地方。鼓浪屿是当时国内医疗条件最好的地方,除了西医、西药外,还有一批中医也具有很高的水平。受到这种环境的熏陶,及鼓浪屿人善良的天性与聪慧的灵性,加上岛上良好的教育,造就了鼓浪屿的许多医学人才。人民医学家、“万婴之母”林巧稚,妇产科泰斗何碧辉,著名内分泌学专家周寿恺,留美医学博士、中国第一个公共卫生专家胡宣明,著名医学家白施恩,著名呼吸道专家、“抗非典勇士”钟南山等,他们都是蜚声国际的医学家。

近代鼓浪屿的医院,主要有:(1)厦门救世医院(1898—1951)。光绪二十四年(1898)创立,主创者为郁约翰。它分男女两馆,称“救世男女医院”(简称“救世医院”)。“救世医院”办有附属医学专科学校。(2)共济医院。民国初期日本人开设,医疗对象主要是日本居留会会员。(3)博爱医院。日本为了扩张势力,以台湾总督府卫生课善邻会的名义,于1918年设立,翌年附办“医专学校”。(4)厦门鼓浪屿医院(1931—1953)。这是鼓浪屿第一所中国人办的较大型的私立西医医院。

1887年,归正教派郁约翰前往厦门宣教。同年年底,他从纽约坐帆船出发来华,同行的有他太太和华约翰牧师(Rev. John Fagg)。途中经过鹿特丹,他停留数日,收到一些支持他的款项。1888年1月13日,郁约翰踏上了厦门的土地。

他在此学习闽南语,之后被派往平和县小溪镇宣教。在此,郁约翰建立了小溪医院,使西医学在闽南地区传播。小溪医院是一座两层楼的医院,有30张病床。据《平和县医院院史》记载:“郁约翰作为虔诚的基督徒,为人和蔼可亲,乐于助人,遇贫苦患者,概予减免优惠,甚至施诊赠药。其医术精湛,诊病认真,对症下药,治疗多效,病人互相介绍,就诊患者络绎不绝,使西医学在闽南地区广为传播。”此外,郁约翰看到中国人受鸦片的毒害,便建立戒烟所,帮他们脱离毒瘾。

1898年4月,他倾心投入创办的厦门第一所正规西医院——鼓浪屿救世医院,正式建成。救世医院为两层楼房,有小礼拜堂1间,饭厅,厨房,工人房2间,办公室,药房,眼科室,学生房4间,病房7间可容45张床。医院不收药费、治疗费及住院费,仅收相当于2分半美金的伙食费。病人大都来自厦门及周边乡下,也有来自漳州、泉州等地的,甚至有外省及马尼拉、仰光等不远万里而来的求医者。病人包括乞丐、富人、平民、官员、学者等各社会阶层的人。从医院开办到郁约翰去世的12年里,共收治了17 000多名住院病人及135 000多位门诊患者,做了7 500多次手术。

郁约翰在鼓浪屿一边行医一边教学,1898年收9名男生、4名女生。郁约翰可谓闽南西方医学教育的先驱。他对学生循循善诱,使学医者深受教益。其学生黄大辟、陈天恩等日后均成为闽南名医。

郁约翰不仅是宣教士、医生,还是一位出色的建筑师。小溪医院及救世医院均由他设计并建造,鼓浪屿著名的八卦楼、船屋、同文书院的主体建筑等,都是郁约翰设计的作品。

1910年春,厦门鼠疫流行,很多人染病而死。郁约翰冒着生命危险救治病人,虽然做了

预防措施,但还是不幸遭到感染。4月14日,郁约翰因病在鼓浪屿安息主怀,享年49岁。次日,他被安葬于鼓浪屿“番仔公墓”。

叶豆仔(1845—1942),鼓浪屿早期著名女中医,民间尊称她为“先生妈”“斗姑”,闽南话“豆”“斗”同音。祖籍福建省同安县(今厦门市同安区)莲花乡,她是华侨界知名人士叶清池的堂姐。四十岁时,舅父送给她外祖父生前用于“放筋”治疗儿科病症的图文手稿和其他中医验方的手抄遗稿。她虽文盲,但记忆力异常好,人们将上述手抄遗稿念给她听后,都能强记不忘,并能配制各种药的散装瓶备用。她在每一个药瓶上贴一张纸,画上图像记号,便能识别使用。

斗姑擅长处理小儿时行热症、惊风、白喉、麻疹、胃肠消化不良、黄疸等病症。有些病人病情严重,经其医治转危为安,有“尸厥”(类似休克,中医术语)而使其复苏之例,曾有一幼儿被原鼓浪屿救世医院首任院长、外国医生郁约翰诊为死症,放弃治疗。患儿的母亲经人指点,抱孩子送叶医生处急救,经“放筋”结合药散治疗后,患儿竟然逐渐复苏。患儿母大喜,千恩万谢,后将患儿抱去找郁院长检查,郁约翰惭愧得无地自容。为了解这起死回生的奥秘,他亲自登门拜访叶豆仔,但对中医的一整套诊断、“放筋”手法及药散的应用,这位外国医生根本无法理解。

斗姑“起死回生”的治疗事例一时传为佳话,当时的“工部局”得此奇闻,立即派员了解情况,予以授匾,名乃大噪,于是求诊者络绎不绝。斗姑对贫苦患者施医赠药,秉此宗旨,以终其一生,卒年九十七岁。

鼓浪屿上经常有此类奇观。这说明中西医各有所长,在攻克疑难杂症时,医生们各具判断,对症下药,满足病患的需求。在西医成为急重症的主要诊疗手段的同时,厦鼓的名中医也深受信赖,坐堂门诊,病患络绎不绝。林芝光、谢宝三、李家麒、黄思藻、郑意澄、高春泽、杨捷玉等,都是很著名的中医师。他们每个人都有很长时间的治病病患的经历,治病救人,妙手回春,民间流传着他们的种种故事。民众至今依然感激和怀念他们。

## 五、闽南白话字:奇妙的跨文化传播

元代以来,西方传教士陆续到中国来传播西方宗教,为了传教,传教士必须学会中国的语言,而中国的汉字不能表音或不能正确表音,各地方言土语又妨碍着汉字的正确读音,用他们熟悉的拉丁字母(即罗马字母)记录和拼写中国话,是他们最容易想到和做到的事情。明万历年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创制的《西字奇迹》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用拉丁字母拼写汉语的拼音方案。以后又出现了许多洋人创制的汉语拼音方案,其中影响最广、最久的是英国人威妥玛的方案。今天的中老年人还记得的 Peking(北京)、Tientsin(天津)、Hengta(恒大)、Moutai(茅台),就是威妥玛式拼音。

基督教新教传教士要传播“福音”,就必须与传教对象面对面地交流,汉语与西方的字母文字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语言体系,对于习惯了字母文字的新教传教士来说,学习汉语的难度相当大。他们宣教的对象绝大多数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民众。普通民众说的是当地方言,这就意味着新教传教士需要解决以方言传教的问题。

鸦片战争后,中西文化剧烈碰撞,进入中国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为了克服语言困难,便于传教布道,采用罗马字拼写各地方言,创制了“方言教会罗马字”。这些“方言教会罗马字”大多是拼写汉语方言的,有闽南话(含厦门、泉州、漳州、潮州等音系)、兴化话、福州话、建

瓯话、客家话、海南话、温州话、宁波话、上海话、山东话和北京官话等,共 17 种。其中,最早出现的是产生于厦门的“闽南白话字”。

根据当时在广州传教的美部会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 Williams)的统计,一般在每个传教士有效的工作年限中,要减去整整三年学习汉语的时间。对于大多数传教士来说,学习语言是永远无法完成的任务。为了克服语言难关,提高传教效率,有的传教士便将自己平常所学到的方言现象,具留手册,以便查阅。此后,为了更广泛地帮助后继者便捷地学习方言,他们索性将自己日积月累的方言语素编辑梳理,刊而出之。这些“刊而出之”的小册子便是最初的方言字典。

基督新教传教士编纂方言字典的另一个意图,是便于信徒判读罗马字文献,授受教义。清时闽台地区能够读书识字的人寥寥可数,绝大多数教徒目不识丁,根本无法阅读《圣经》,更谈不上理解基督教教义,而新教传教士向来认为《圣经》是信仰的唯一源泉,人们只有了解《圣经》,阅读《圣经》,亲身体味其中的含义,方可得到救赎。编纂罗马字拼音的方言字典,就可以帮助信徒学习白话字,学会阅读白话字《圣经》,进而能够更好地理解基督教教义。

据资料记载,白话字正式在厦门推行始于 1850 年,历史则可追溯到 1815 年马礼逊在马六甲开办英华学院所拟定的汉语罗马字方案。英华学院无疑是最早酝酿方言罗马字的所在。厦门话的第一个方案也可能发源于英华学院。

它起初是为外国人学厦门话而设计的。当时外国传教士来厦门传教,就是使用这一方案学习厦门腔闽南话。1844 至 1848 年,约翰·卢为了帮助传教士学习厦门腔闽南话,还在厦门编了一本《罗马化会话字典》(即《厦门词汇》)。后来,传教士们为了让信徒们自己阅读《圣经》,就用白话字来翻译《圣经》。第一个用白话字翻译《圣经》的是养雅各。

第一个用白话字对教徒进行教学的是约翰·凡·涅斯特·打马字。美国归正教牧师毕腓力在 1901 年所著的《关于厦门——一个中国首次开埠港口的历史与事实》中认为,在中国所有 60 年的传教工作中,也许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约 60 年前厦门罗马话的创立。他分析,这种新的中文文字体系的主要创办人也许要以打马字牧师最有资格。传教士正在实验依靠罗马字母系统,《圣经》与其他宗教书到底是否可能传给信徒们,或传给那些虽不会阅读但对基督教有兴趣的人自己去阅读《圣经》。

首先印刷到书上的是翻译《创世纪》的一部分——特别是约瑟的历史——译者是养雅各。养雅各第一个翻译并用罗马字拼《圣经》的一部分,即《创世纪》中约瑟的历史记载。

1844 至 1848 年,约翰·卢还在厦门编了一本《罗马化会话字典》(即《厦门词汇》),显然也是为了帮助传教士学习厦门话。可见这种厦门话罗马字起初是为外国人学习厦门话而设计的。

近代,来闽台地区传教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为了克服语言障碍、提高传教效率,针对闽台地区的闽南语和福州话这两大区域方言,编撰了一定数量的闽南腔方言字典和榕腔方言字典。这些方言字典保存了大量闽台方言中业已流变的古音,创制了汉语拼音方案,促进了闽南白话字的产生,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闽台地区的文化教育。

在闽南白话字推行初期,罗音、打马字、杜嘉德编纂了一部《英一中厦门本地话指南》。之后,杜嘉德根据约翰·卢的《罗马化会话字典》(《厦门词汇》)编纂了一部《厦门本地话或口语字典》。后来,打马字又参考杜嘉德的字典编纂了一部《厦门音字典》(1894)。这些对闽南白话字的形成和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新教传教士所编的闽南腔方言字典中,影响最大的当属英国长老会传教士杜嘉德(Carstairs Douglas)的《厦英大辞典》(*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杜嘉德在厦门传教期间,潜心研究闽南语,广泛采集闽南各地方言词素,汇集成册。1873年,他所编纂的《厦英大辞典》在伦敦出版。该辞典绪言及说明有19页,收录闽南方言40 000余条。

据杜嘉德在序言里的介绍,他的这本辞典是在已故美国长老会牧师庐一(John Lloyd)所遗留下的《厦门语字汇》手稿的基础上编写而成的。《厦英大辞典》采录的闽南方言非常广泛,以厦门腔音为标准,遍及漳州、永春、惠安、安溪、同安、长泰、南安等地方言。该辞典行文不用汉字,腔音用罗马字拼音,词意用英文解释。

《厦英大辞典》的出版,立即受到闽台地区宣教士、商人、船员等的青睐,成为所有学习闽南语者必备的工具书。其实,杜嘉德编纂该字典还有一个直接的意图:便于前往台湾宣教的长老会传教士学习当地方言。杜嘉德在《厦英大辞典》序言中直言不讳地说:“台湾近两百年以来,不断有移民迁入,大多数来自厦门、漳州、泉州。台湾岛上有几处常可指出显系来自中国本土之某几处之殖民。但台湾岛内所见来自上述各地之各种方言已颇为混杂。”长老会传教士有了这本工具书,学习台湾方言就容易多了。但是经过半个世纪之后,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许多新名词在该字典里都没有收录。为了适应时代的需要,英国长老会传教士克礼(Thomas Barclay)受委托对该辞典做补遗工作。

1874年,巴克礼受英国长老会派遣来台湾传道。他是位敏锐而谨慎的人,居留台湾几十年间,不断学习当地语言,且将所听到的用语,不管好坏都记录下来。1913年,闽台地区的传教士共同约请巴克礼重新对《厦英大辞典》进行编纂,增补其缺。

1855年,罗音编纂的《英中厦门本地话指南》(即《厦门话课本》)在广州出版。之后,杜嘉德编纂了《厦门本地话或口语字典》。打马字先是于1852年编写了一本《唐话番字初学》,后来又编纂了《厦门音字典》(1894)。这些对闽南白话字的形成和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闽南白话字产生以后,在教会里迅速传播,影响很大。它从厦门传播到闽南各地,从福建传播到台湾,从中国传播到东南亚。从1850年到民国初年,它盛极一时,取得了预想不到的效果。教会白话字的成型和推广,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再一次掀起闽南文化特别是闽南方言的传播热潮。

1918年,《新青年》五卷二期发表的朱我农从日本的来信说:“1900年我与厦门雷文铨君同居苏格兰之爱丁堡,看见他的家信,凡从厦门来的,都是一种非希腊、非拉丁、非英、非德的文字,我一点都看不懂。雷君告诉我,这是厦门话用罗马字拼出来的,并说这种文字的如何利便,如何易学。”雷文铨是厦门人,当时留学英国,专攻土木工程,回国后曾主持厦门市改建工作。

可见当时教会推行闽南白话字的盛况和效果。1917年,闽南各基督教会还发起一个运动,要求当时教会中的每一个教徒都能读白话字圣经。

20世纪20年代以后,由于国语运动的兴起和注音字母的推行,教会不再宣传白话字,但是白话字的影响在教会里却不断扩大,许多教徒继续学习和使用白话字,用白话字读圣经,还用白话字写信。

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高温(John Macgowan),又名马约翰,对闽南方言的研究造诣颇

深,成绩斐然。1871年,他在厦门刊印闽南语初学指南书,名为《厦门方言手册》(A Manual of Amoy Colloquial)。这是一部典型的方言读本,依据此书所引词句,可以考察闽南方言的大概情形。

1883年,麦高温又编撰了一部与杜嘉德《厦英大辞典》篇幅相当的巨著《英厦辞典》(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of the Amoy Dialects)。该辞典共611页,其一大特色是“厦译并列汉字及罗马拼音白话字”。麦高温主要参考的是杜嘉德的《厦英大辞典》。杜嘉德曾在其编撰的《厦英大辞典》序言中说:“有厦英而无英厦是一个缺点,英厦辞典待另编写。”此愿望终于由麦高温实现了。

打马字的遗稿《厦门音的字典》是一部独具特色的闽南方言字典,但他没有编撰完就去世了。他死后两年,即1894年,经美国归正会传教士来坦履(Daniel Rapalje)补编后,方由厦门鼓浪屿萃经堂刊印。

《厦门音的字典》的重要价值在于,它为英国长老会传教士甘为霖(William Campbell)编撰《厦门音新字典》提供了蓝本。

甘为霖毕业于英国著名的格腊士高大学(Glasgow University),后又在神学院进修神学课程。1871年,英国苏格兰长老会应在台湾南部从事医务传道的马雅各医生(James Laidlaw Maxwell)之请,派甘为霖来台协助传教事业。1913年,甘为霖编纂的《厦门音新字典》由日本横滨福音印刷株式会社印刷出版。该字典所收字数约有15 000字,主要选自《康熙字典》,腔音取自漳泉台通行的土音,且较重于台南附近的腔调。

《厦门音新字典》出版后,颇受欢迎,应用甚广,人们简称它为“甘字典”。该字典相对于前几部闽南腔方言字典而言,体系更加完备,适用的范围更加广泛。杜嘉德的《厦英大辞典》,用英文注释,却没有汉字与之对照,对于习惯于用汉字的人来说使用很不方便。巴克礼的增补本虽然有汉字,但其注释仍用英文。《厦门音新字典》的注释、用法均用白话字,中国人若拥有此字典,就可用厦门音来识字。由此可见,甘为霖编此字典的对象已不仅局限于西方人了。

## 六、卢戇章——语文现代化的孤独担当

卢戇章受传教士创制闽南白话字的启发,创制了汉语拼音文字。他来自鼓浪屿,一生为我国语文现代化而奋斗,成为汉语拼音的先驱。

闽南白话字产生后,从厦门传播到闽南各地、台湾及东南亚,自1850年到民国初年,妇孺皆知,盛极一时。20世纪20年代以后,由于国语运动的兴起和注音字母的推行,教会不再宣传白话字,但是白话字的影响在教会里却不断扩大,许多教徒继续学习和使用白话字。

后来同安人卢戇章受到打马字闽南白话字推行工作的启发,创制了拼音文字,并于1892年出版《一目了然初阶》(《中国切音新字厦腔》),这是第一个由中国人自己发明创造的字母式汉语拼音方案。民国期间推广了注音字母的拼音方案,卢戇章成为中国提出汉字拼音化的第一人,被誉为“现代汉语拼音文字之父”。

1892至1911年,正当甲午中日战争和维新变法运动时期,中国发生了切音字运动。当时,中国面临着被世界列强瓜分的严重危机。在这国事动荡、人心思变的年代,爱国知识分子忧国忧民,力主变法图强。于是,维新运动就成为群众性的爱国主义运动。一些爱国的知识分子考虑到要救国图强就要普及教育、培养人才,就要克服繁难的汉字所造成的障碍。这

样,切音字运动就在改良主义思潮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了。1891年,宋恕在《六斋卑议》中首先提出“须造切音文字”的主张。1892年,福建人卢懋章写成了第一个中国人自己创制的字母式拼音文字方案《一目了然初阶》,标志着中国人自觉进行的语文现代化运动的开始。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卢懋章特地万里迢迢从厦门跋涉至北京,将经过全新修订的《中国切音字母》专程送审,请求推行。但学部与外务部相互推诿,让卢懋章足足等了一年。次年,卢懋章再度具禀,最后仍被搪塞驳回。

经此打击,卢懋章深感官僚腐败,朝廷自是病入膏肓,再盼其核准已属奢望,便黯然离京。1906年,他于返厦途中,路过上海,将《中国切音字母》内容再次修订,以《北京切音教科书》为名,分两册,交于上海点石斋出版发行。另他又出版了《中国字母北京切音合订》一书,内容包括《中国切音字母》(即总字母表)以及《制字略解列表》,并制定了官话、福州、泉州、漳州、厦门、广东6种切音字方案。此后,卢懋章改变策略,身体力行,辗转四方,面向社会全力宣传推广。

《北京切音教科书》卷首便明示推行切音字的两大宗旨:一是统一语言,有利于国民团结;二是言文一致,有利于普及教育。所谓“统一语言”,即规定以北京话为正式通行口语;所谓“言文一致”,即提倡以白话文为标准通用书面语。以上两点正是中国语文现代化运动的主基调和核心元素。书中还详尽具体地提出了“十条办法”的主张,作为强化推行的一系列措施建议。

卢懋章先后设计制定了3套汉字拼音方案:第一套采用的是拉丁字母符号,第二套采用的是仿日本假名系符号,第三套采用的是汉字笔画式符号。他的拼音方案采取声韵双拼法,既继承中国的反切传统,又借鉴西方的拼音文字。他于1892年在厦门发表的“中国切音新字”成为我国自主拟订的第一个拉丁字母拼音方案。它的发表,标志着中国语文现代化运动帷幕的正式揭开。

语文现代化,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推行共同语,二是实行白话文,三是提倡简化汉字,四是创制拼音字母。为图强,致力于文化救国、教育救国,卢懋章毕生从事拼音文字工作40年,造就了中国语言文字学界旷古以来的“七个第一”人:第一个发明拼音字母、新式标点符号;第一个提倡白话文、国语、简化汉字、横排横写和注音识字。他被誉为中国拼音文字运动的先驱和我国语文现代化运动的揭幕人。

自1892年以来,在卢懋章不遗余力的推动下,厦门成为中国语文现代化运动的发祥地。整个闽南地区(尤其是厦门)乃至全国,不少有识之士意识到推广“官话”(即普通话)和国语的重要意义,纷纷积极投入普通话的教学与宣传活动,有力地推动和促进了我国语文现代化运动的发展。

1923年,教育部的国语统一筹备会召开第5次常务大会,钱玄同提出《请组织国语罗马字委员会方案》,论述了26个罗马字母的世界通用性。1928年9月,大学院院长蔡元培正式公布《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字母用法接近英文而又适应汉语特点的“国语罗马字”拉丁字母拼音方案,其特点是音素制,注重词的连写,26个拉丁字母以外不用新字母,采用字母标调法,不用符号标调法。当时的中国政府对推行国语罗马字并不热心,加上拼写规则烦琐、难学,妨碍了其普及、传播,故始终没有走出知识分子的圈子。

后来,国语罗马字的制定者之一林语堂,设计了一种比较简单的字母标调法:阴平不标,阳平在主要韵母后加r,上声重叠主要元音字母,去声加h。国语罗马字在今天对我们还有